

研究

《焦氏筆乘》

史振卿 著

《焦氏笔乘》研究

史振卿 著



齊魯書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焦氏笔乘》研究 / 史振卿著. — 济南: 齐鲁书社, 2013. 8

ISBN 978-7-5333-2757-6

I. ①焦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笔记—中国—明代—选集②中国历史—史料—明代③《焦氏笔乘》—研究
IV. ①K248.0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79005 号

《焦氏笔乘》研究

史振卿 著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
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
邮 编 250002

网 址 www.qlss.com.cn

电子邮箱 qilupress@126.com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

开 本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 10

插 页 3

字 数 207 千
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33-2757-6

定 价 38.00 元

此书得到海南师范大学出版资金和海南省重点
(培育)学科资金的资助

序

杨 昶

又睹史振卿《〈焦氏笔乘〉研究》文稿，如见故旧，趁受托作序的机会，说一说其中的缘由。

乙酉(2005)秋，史振卿君年届而立之年，负笈自豫北抵鄂，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。是所由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于1979年创立，系全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学研究生学位点，为湖北省重点学科单位；数代师承，世誉“张门”，精研古典，学风谨严，弟子习染，克绍术业。我有幸早先师从舜徽先生，遂备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研究生导师。振卿来到桂子山校园后，经导师、学生“双向选择”而归于我来指导，师生缘分始定。

业师舜徽先生生前曾经力排陈见，谓“明代学术不可全谓为空疏”(《爱晚庐随笔·学林脞录》)。受此教诲，我在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时候，多将视阈置于“明代典籍之研究与整理”中，对宋濂、杨慎、梅鹗、胡应麟、陈献章、何心隐、王士性、



徐霞客、焦竑、陈第等人的文献和学术有所留意。因此,在给硕士生们确定课题研究范围时,经常以这些名家的著述作为选项,供他们各取所需。振卿入学后不久,便和我认真商讨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之事,最终确定了学位论文所瞄向的“标靶”,即焦竑之著述与学术。振卿在较短的时间内,完成了对焦竑著述的全面搜集、清理和著录工作,撰写了论文《焦竑著述考》(载《历史文献研究》第26辑,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)。论文发表后,振卿受到了学校的奖励。2008年,振卿在仔细研读多部焦竑著述的基础上,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《〈焦氏笔乘〉研究》,并以全优的成绩通过论文答辩。2009年,《〈焦氏笔乘〉研究》被评为“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”,荣获湖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、湖北省教育厅颁发的荣誉证书。自2008年以来,史振卿赴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,其间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,继而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历练,学术上日臻成熟。现在《〈焦氏笔乘〉研究》经过振卿悉心修改和补充,即将付梓,乃是繁荣学术、嘉惠同仁的好事情。

被称为“巨儒宿学”的焦竑(字弱侯),生于南京应天府上元县,是明代后期的大学问家。他具天资而早慧,幼得令名却命蹇。弱冠之年便获南都地区童生考试头彩,25岁于乡试登榜“点贤书”;不料盛年之期凡七次会试均落第,蹉跎了四分之一世纪的青春。迄于万历十七年(1589),焦竑以五旬垂老之秋赴会试得中,殿试被御笔点为状元。焦竑中魁后在宦海几经沉浮,十载煎熬再无恋栈之心,遂挂冠归隐,潜心四

部,辨章学术不辍,裒集频年述作。焦竑虽官场失意,但在江南学苑则享有盛誉,被视为士林领袖,史称“博极群书,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,善为古文,典正驯雅,卓然名家”(《明史·焦竑传》)。

焦弱侯著述之宏富、涉猎之广博、考订之创见、学术之高识,于明季硕儒之列罕有等侔者,诚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四六所言:“明代自杨慎以后,博洽者无过于竑。”余英时先生在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外篇之《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》一文中论述:“在心性之学方面,弱侯实可说是一结束人物。此与其在博学考订方面之为一开创人物,适成为有趣之对照。”张舜徽先生认为:“焦弱侯自是明代博学高识之士,故昔人辨章学术,常取弱侯与郑渔仲(笔者注:即郑樵)并论。焦氏著述既富,而议论多通……信乎其为一代儒林冠冕也。”(《爱晚庐随笔·艺苑丛话·品书画第一》)凡此种种评价,均为切中肯綮。

《焦氏笔乘》系弱侯的代表作,采用的是读书札记的体例,汇聚焦氏一生的重要学术成果,是研究明代文献考据学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。学术界对《焦氏笔乘》的研究著述,主要有以下数种:吴荣政《刘知几〈史通〉评述书目考——兼为〈焦氏笔乘〉二则纠谬》(载《湘潭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1993年第3期),指出《焦氏笔乘》于《史通》所载古今正史及偏部短记148种的基础上,虽加补苴,但仍有五点缺憾;王炜民《〈焦氏笔乘〉的文献学价值》(载《阴山学刊(社会科学版)》1994年第3期),从文字、音韵、注释、辨伪、考据等五方



面论述《焦氏笔乘》的文献学价值；龚仕明《〈焦氏笔乘〉医方杂识》（载《中医文献杂志》1999年第3期），考订《焦氏笔乘》所辑录笔记文集内百余条医方，于中医发展有益；陈瑞芳《从〈焦氏笔乘〉看焦竑文献考据学研究》（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），重点探讨焦竑反对空疏学风及学术经世的文献考据学思想，及其考据实践在晚明学风转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。此外，李剑雄先生在《焦竑评传》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）专辟“焦竑考据学的内容与成就”一章，据《焦氏笔乘》、《澹园集》、《俗书刊误》等著述探讨焦竑的学术建树，而亢学军《从〈焦氏笔乘〉看焦竑的文献考据学成就》（载《苏州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04年第4期）未能突破李著之藩篱。林庆彰《明代考据学研究》（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版）就《焦氏笔乘》中的诗歌考证作了论述，南柄文等所著《明代文化研究》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）肯定了焦竑在文字学、训诂学、音韵学、考据学等方面的贡献。

与上述研究成果相比较，史振卿所著《〈焦氏笔乘〉研究》与它们各有侧重，短长互补；诸人的精华叠加，足以架构为一个研究焦竑思想和学术的共同体。况且《〈焦氏笔乘〉研究》的篇幅更大，涉及的层面更丰富；在理论运用、谋篇布局、资料发掘、考订辨析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，凸显了它的原创性。行文于此，笔者不想再书褒美言辞。《〈焦氏笔乘〉研究》之优劣短长，还要由读者们来评价。相信人们阅过都会得出中肯看法的。

经过多年的砥砺，振卿“由一名对学术茫然无知的中学

老师蜕变成把学术作生命的高校老师”(史振卿博士学位论文《清代〈尚书〉学若干问题研究》后记),但是今后的学术生涯还很漫长。期盼他仍不懈怠,积跬步以至千里,勛哉!

因徇师生之谊,为短序千言于其端焉。

癸巳夏杨昶于武昌南湖听风簌

目 录

序	1
绪 论	1
一、明代学术思想演变概要	1
二、笔记体著述琐谈	7
三、《焦氏笔乘》研究概况	13
第一章 《焦氏笔乘》的文献学价值	20
第一节 文献学概要	21
第二节 《焦氏笔乘》在版本、校勘和目录 畛域的价值	29
第三节 《焦氏笔乘》在辨伪、考证和辑佚 畛域的价值	62
第四节 《焦氏笔乘》在“小学”畛域的价值	100
第二章 《焦氏笔乘》的哲学建树	125
第一节 哲学之旨趣：尽心至性之学	126



第二节	哲学之归宿:三教会通	143
第三节	《焦氏笔乘》的易学和道家思想之建树	156
第三章	《焦氏笔乘》的史学贡献	177
第一节	《焦氏笔乘》史料考据学之成就	177
第二节	《焦氏笔乘》研究《史记》之成就	185
第四章	《焦氏笔乘》的诗学贡献	195
第一节	《焦氏笔乘》对《诗经》教化研究的贡献	196
第二节	《焦氏笔乘》对诗评研究的贡献	204
结 语	《焦氏笔乘》的学术地位	215
附录一	《焦氏笔乘》辑佚	221
附录二	焦竑著述考	280
参考文献	302
后 记	308

绪 论

一、明代学术思想演变概要

明初学术思想在政府的主导下确立朱子学的绝对权威地位,刚继大统的朱元璋于洪武元年(1368)三月就下令设科举取士,科考的内容以朱子学为准绳。永乐二年(1404)严厉惩罚诋毁程朱理学的饶州儒士朱友季,^①与此同时,朱棣在永乐年间相继编成《五经大全》、《四书大全》、《理性大全》,并亲自作序:“有发明经义者取之,悖于经旨者去之”,确立了“道之在天下,无古今之殊,人禀受于天者,无古今之异”,^②并规定了士人阅读与理解的取向。在这样的视域下,明初学术则“原夫明初诸儒,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,师承有自,矩矱秩然。曹端、胡居仁笃践履,谨绳墨,守儒先之正传,无敢

^① [明]沈德符: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《献书被斥》,中华书局1959年版,第633页。

^② [清]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卷九十八《艺文志》,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2425页。



改错”^①。明初诸儒如曹端、胡居仁等均以朱子为宗，少有发明之处，但对理学的内在发展理路则自有特质。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载：“有明文章事功，皆不及前代，独于理学，前代之所不及也，牛毛茧丝，无不辨析，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。”^②这样的精神旨趣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发生变化，万历年间的李廷机认为：

国初固多才，然而挺然任圣道者寡矣。自河津薛公起而引圣道为己任，卮言细行，必准古遗训而绳之。盖自是天下学道者四起，争自濯磨以承圣范。岂谓尽出河津哉？要之，默自河津启之也。然而士知惇质行已矣，于心犹未有解也。自新会陈公谓：“学必有源，静而反观乎此心之体，得其自然而不假人力。”以为至乐具是矣，其于世之荣名若遗也。盖自是天下学道者，浸知厌支离而反求诸心。岂谓尽出新会哉？要之，默自新会启之也。然以其初知反本真也，则犹隐然与应感二之也。自会稽王公于百难万变中，豁然有悟于学之妙机，以为天下之道原自吾本心而足也。于是揭人心本然之明以为标，使人不离日用而造先天之秘，不出自治而握经世之枢，及其随所施而屡建大勋，则亦由学之约而达也。盖自是天下学道者，浸知显微之无间，体用之一源，藟然有

① [清]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二《儒林传序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，第7222页。

② [清]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·发凡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17页。

中乎道之窾郤。岂谓尽出会稽哉？要之，默自会稽启之也。^①

在李氏看来，明代学术起初没有变化，到王阳明的时候，由于阳明悟得学术妙机，才改变学术发展的取向。学术在正德和嘉靖年间发生很大的变化，葛兆光认为，自宋以来构建而成的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同一性遭到破坏，出现程度的断裂，导致士人开始去寻找解决这种断裂的灵丹妙药。^② 在笔者看来，“大礼仪之争”在这次学术变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明世宗嘉靖 15 岁时，以藩王身份继皇帝位，登基后不顾礼制，为了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帝，不惜与群臣反目。嘉靖的父亲兴献王最终被追封为睿宗。史称“大礼仪之争”。这次斗争的结果是，以杨廷和为代表的一派被罢官。权力之间争斗的背后是思想的纠结和挣扎，士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程朱理学的权威性。士人们通过苦读儒家经典，通过追问“学统”，探求“道统”，进而问鼎“政统”，他们也希望通过“道统”对政治有所干预，对皇权有所限制。“大礼仪之争”的结果是，他们对这种逻辑产生了怀疑，他们苦苦追求的理想世界，在皇权面前显得苍白无力，士人们所拥有的知识资源无法疗治变化万端的国家与社会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嘉靖皇帝即

① [明]陈献章：《陈献章集》附录四《从祀文庙疏议》，中华书局 1987 年版，第 927～928 页。

② 葛兆光：《中国思想史》第二卷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，第 294 页。



位后,随即就宣布:“自今教人取士,一依程朱之言,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,私自传刻以误正学。”^①学界主导的思想怎样解决社会的危机,士人们内心的紧张要如何调适?诸如此类问题,引发士人们的思考。而日益受到士人们推崇的阳明心学得到多方的关注。

阳明和程朱在学理上是一致的,都是功夫论,都是在追问“道”的时候采取的方法而已,只不过程朱是向外求于物,而阳明是向内求于心。王阳明对程朱的修正,首先从“心”开始,他认为:“心即是理也。天下又有心外之事,心外之理乎?”“此心无私欲之蔽,即是天理,不须外面添一分。”^②在王阳明看来,“心”中自发的“道心”与“天理”相符合,同样与人间的“礼”相一致。那么“心”不仅是道德的来源和本身,而且也是道德的监督者,人们不需要假借于外物,通过对“心”的体悟,就可以获得一切。在“心即天理”的基础上,王阳明也反对程朱的知行观。由于程朱高度重视“格物致知”,于是把向物探求“道”的学习,与亲自践行分离了,即“知”是一件事,“行”是一件事。王阳明认为“格物”并不是追求“心”外之物,因为这些“物”是靠“心”控制的感觉器官来完成的,“无心则无身,无身则无心”,身心一体,所谓身与心:“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,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,指心之发动处谓之

^①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十九,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,第7603页。

^② [明]王阳明著,陈荣捷注评:《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》(修订版)卷上《传习录》卷上,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版,第30页。

意,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,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。”^①所有的物,在王阳明看来都是为了确立纯明澄澈的心,即“良知”。所以“博学”是使“心”中无时无刻、无处不在存“天理”,“笃行”就是不断地学习这种“存天理”,一旦良知发动,知就是行。^②这种内求于心的理路使士人们暂时摆脱程朱思想的约束,他们通过向内心拷问自己的良知,就可以得到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。

王阳明对程朱的修正也是从古代经典开始的。王阳明认为程朱对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的诠释不符合古义,于是他开始探究古本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的原义。对古义的追求的思潮与文学复古、追求灵性遥相呼应。以李梦阳、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,倡言复古,“广教化之源,崇文雅之致,削浮华之风,敦古朴之习”^③。在追问良心的学理下,以李攀龙、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再倡复古。他们提出的“作诗本乎情景”、“神与境合”,^④以及他们提出的创作过程中的“悟”说,重视作家的创作个性,提倡“自得”之文。以袁氏兄弟为代表的“公安派”提出“世道既变,文亦因之”和“性灵说”,要求文字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,能直抒胸臆,不事雕琢,使明代文风不断掀起

① [明]王阳明著,陈荣捷注评:《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》(修订版)卷下《陈九川录》,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版,第282页。

② [明]王阳明著,陈荣捷注评:《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》(修订版)卷下《黄直录》,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版,第302页。

③ [明]徐祯卿:《谈艺录》,《四库全书》本,第45页。

④ [明]谢榛:《四溟诗话》,丁福保辑《历代诗话续编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1198页。



波澜。

在复古和灵性的文风影响之下，一批学者开始反思心学。阳明心学由于他的简捷和高调，给明代学术带来巨大的冲击，但是他的思想也给明代学术带来更大的困扰。王阳明在“天泉证道”提道：“无善无恶是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是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”^①这就是后来被称为“四句教”的师门之训。由它则引发了人们道德实践的两个不同的取向^②：第一个取向是钱德洪的诠释，钱德洪主张心体虽无善恶，但为习染所侵，已有善恶在，故要用为善去恶的工夫复其本体，坚持渐悟渐修的途径，即在“慎独”中追求“中和”，以“戒惧”来追问“良知”。^③无疑，钱德洪通过这条路径坚守着儒家的道德底线。第二个取向是王畿的诠释，王畿认为：“心是有善无恶之心，则意亦是有善无恶之意，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，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。”^④在王畿看来，心、意、知、物均是“有善无恶”，也就是说，由心产生的所有感觉全部具有合理性，与佛家“我心即佛”毫无差别了。正如《明史》载：“（王畿）竟

① [明]王阳明著，吴光等编校：《王阳明全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1306页。

② 关于这种动向，可以参考葛兆光：《中国思想史》第二卷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312~314页。

③ [清]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》卷十一《浙中王门学案一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227页。

④ [明]王畿：《王龙溪先生全集》卷十四《原寿篇赠存斋徐公》，清道光二年刊本，第46页。